



张洁
文集

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张洁
文集

世界上最疼我
的那个人去了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七月底，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，身体也分崩离析地说垮就垮了。好像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就不行了，连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。

而妈可能早有预感。

妈去世后，唐棣学生时代的好友石晓梅对我说，六月份她来看妈的时候，就觉得妈明显地衰老了。妈去拿笔记本，想要记下晓梅的电话。可是刚拿出笔记本就茫然问道：“我拿笔记本干嘛？”

晓梅说：“您不是要记我的电话吗？”

就是这次，妈伤感地对晓梅说：“我再也看不见唐棣了。”

晓梅说，以前妈也常说这样的话，但她从未介意，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常有如是之说。可是这次，妈再这样说的时候，晓梅觉得她是真的再也看不见唐棣了。

一九八七年妈得黄疸型肝炎以后，我每半年带她做一次B超，检查她的肝、脾、肠、子宫等等，医生每次都说她什么病也没有，一定能活到一百岁。

我虽然不敢奢望妈活到一百岁，我想她活到九十岁、九十五

岁,是不成问题的。

我这样盲目地乐观,还可能是因为妈太自强、太不需要我的关照,什么事都自己做。就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因为黄疸型肝炎住进医院的前几天,她还自己步行到魏公村口腔医院看牙呢;

就在妈去世前的五六个月,还给我熬中药呢;

就连胡容都看出,一九八四年唐棣走后,妈老了一大截。一九八七年得了黄疸型肝炎后,又明显地老了一截。而我却总是看不到妈的衰老,我对她的关心,是不是连外人都不如?

医生的良好祝愿正中下怀地鼓舞了我、欢愉了我,从而也麻痹了我。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,从而忽略了妈毕竟是八十岁的老人,以致我大意失荆州。这可能也是造成妈过早地去世的原因之一。

而且我那时不知为什么愚蠢地认为,那个半年一次的B超检查,就是妈整个健康状况的鉴定,既然做B超的医生说她什么病也没有,她就真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了。我现在悔之晚矣地悟到,其实B超了解的只是腹腔方面的情况,其于心、肺、脑方面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。以我的智力,这本是略动脑筋就能想到的事,然而我却没有想到。

我算是大不孝了。

妈年事渐高以后,我并没有经常守在她的身旁,而是把她丢给小阿姨,或游走异国他乡、或应酬交际、或忙于写作、或去陪伴我的先生……以为有小阿姨在她身边,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

尽管现在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把妈的一点骨灰带上,可这还有什么用呢?在她老迈力衰,最需要我在她左右的时候,我却把她远远地丢下了。

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我到黑龙江大庆采油七厂采访,她比我

哪一次外出都更想念我。听小阿姨说，她不断地说：“张洁快回来了，张洁快回来了。”好像在为无人照应的自己鼓劲。

可是我在大庆给妈打长途电话，问她各方面情况如何的时候，她老是说：“没事，挺好的。”

有一次妈便结得特别厉害，急迫地念叨着：“张洁要是在就好了，张洁要是在就好了。”而我却远在大庆。

多少年来都以为妈的便结是老年人的通病，后来才知道，那是由于她的脑垂体瘤已经影响到了她的内分泌系统，从而影响了身体各系统的功能的缘故。

妈从不要求我的关照，从不抱怨我在她八十岁的高龄，还总是大撒手地把她丢给小阿姨。

妈终于禁不住对小阿姨这样念叨我，一定是因为身体异常不适，有一种到了紧要关头的直觉。

我在黑龙江呆了不过十几天。一到家就发现，短短十几天里妈就颤颤巍巍地塌了腰。走起路来磕磕绊绊，举步维艰，两只脚掌嚓嚓地磨蹭着地面。裤带也常常忘了系，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。

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。

可我还是想不到，或不愿意那么想：妈是不行了。我还以为，或我宁愿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。

我说：“妈，您怎么这样走路？好好走。”

或者我在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，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？尽管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，但是为什么一见妈那样走路我就心里发紧？我心里越是发紧，却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：“妈，好好走。”

妈就抵赖、隐瞒、解释着，说她脚底疼，或是鞋不合适，或是刚睡起来、刚坐起来，腿脚还没活动开……

也许妈心里早就明白,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,也蒙混她自己——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。

那个时候妈大概就知道她已经不行了。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,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——一直是互相搀扶才挣扎过来的,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队列,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。

所以妈的抵赖、隐瞒、解释里,总含着隐隐的歉疚。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,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,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,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、挣扎,是她对我的一种背弃。

妈的两只眼睛,总是老泪凄凄的。

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信眼科医生的话,妈的视力不好,是因为长了白内障的缘故。而白内障一定要在它的翳子蒙上整个眼睛后才能手术。我们不懂,不懂也没问个明白,为什么十几年过去,妈的视力差不多等于零了,翳子还没有蒙上她的眼睛?

有两次胡容来看妈,恰好我不在家。她应声开门之后竟看不清是胡容,问道:“你找谁呀?”

胡容说:“姥姥,您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?”

妈说:“哎呀,听声音才听出来是你。”

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现了重影。妈常说,有时能看见两个我,有时半夜醒来,老看见屋子里有人,或有几个小孩子在乱跑。“刚开始我还挺害怕,后来就习惯了。”妈说。

现在,不用念医学院我也懂了,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查不出别的毛病,视力却越来越差的话,就应该考虑是否是瘤子压迫视神经的缘故。可是却没有一个念医学院的眼科医生想到这一点。说他们是庸医恐怕不够公正,只能说他们没有想到。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能够研究一下,一个视力已经近乎零的白内障患者,

她的翳子还蒙不上整个眼睛,是否和脑子里发生占位性的病变,压迫视神经有关?如果那样,妈早在她还可以承受手术的年龄就做手术的话,我现在还有妈。

妈的左肩更加歪斜了。

妈左肩的歪斜,可能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。那一年五月十三号我去意大利的时候还没有发现,后来我从意大利转往美国,并在一九九〇年二月把她接到美国的时候,突然发现她的左肩歪斜了。不过那时远没有一九九一年夏天歪斜得这么厉害。我说:“妈,您的肩膀怎么歪了?”

妈辩解说:“这是因为右手老拄拐杖的缘故,右肩老撑着,左肩就歪塌下去了。”妈几乎不拄拐杖,拐杖拿在她手里只是心理上的一种依赖,哪里是什么“右肩老是撑着,左肩就歪塌下去”。她只是不肯承认那是衰老的象征。在她辩解的深处,恐怕隐藏着对衰老无力、无奈的忌讳,更主要的是她知道我不愿意她老。

我老是一厢情愿地觉得,妈还是拉扯着我在饥寒交迫、世态炎凉的日子里挣扎、苦斗的母亲。有她在,我永远不会感到无处可去,无所依托。即便是现在,我看上去已经是足够的强大、自立、独立的样子了。只有妈深知,这不过是看上去而已。

妈也一厢情愿地想着她不能老,更不能走。她要是老了、走了,谁还能像她那样呵护我、疼我、安慰我、倾听我……随时准备着把她的一腔热血都倒给我呢?

随时,我的眼前都能现出妈住进医院的前一天,坚持锻炼的样子:手杖依旧横空地握在右手,她常说:“我不拄,我就是拿着它壮壮胆。”不管命运如何安排,她要以八十岁的老身奋力延缓着依赖他物、他人那个时刻的到来;

发卡胡乱地卡在头发上。稀疏的白发,东一绺、西一绺地四下支棱着。妈是极要体面的人,不管条件、情况怎样,她总是把我和她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。可是,早晚有一天人人都会有的,那个力不从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;

双臂勉力地、尽快地摆动着,好像还在协调地配合着快速、利索,其实举迈已经相当艰难的双腿;

妈晃动着双臂往前挣扎着,满脸都是对生命力,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的不明不白、不甘不屈,以及在这毫无胜利指望的斗争中、心力耗尽后的空虚。

妈明显地食欲减退,吃什么都不香了。

而以前妈的胃口总是很好,饭量比我还大。更让人不安的是,我要是不给她夹菜,她就光吃饭。给她夹了菜,她就光吃放在饭上面的菜。我要喂她,她又不肯,就只好把她碗里的饭菜拌匀了让她吃。

吃饭的时候,眼睛茫然地瞪着前方,不知其味地、机械地往嘴里填着。端碗、拿筷子的手也颤抖得厉害,已经不能准确地把饭菜送到嘴里去。连端碗的样子都变了,不是端,而是用左手的食指抠着碗边,把碗夹在食指、拇指和中指的中间。我纠正她几次,可是没用,下次她还是那么拿碗。

妈的脑子里,好像什么都装不进去了。

妈终日倚在沙发上昏睡,任门户大开。

到现在,妈那昏睡的样子还时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。特别是那一天,我走进她的房间,见她睡得简直昏天黑地。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,干这干那,她也不曾感到丝毫的干扰。她那毛发日渐稀疏的头(妈的头发本来就少,但是不秃),枕在沙发的

扶手上。那张沙发是我们经济上刚刚翻身的时候买的，式样老了一点。扶手比较高，所以她的脖子窝着，下巴自然杵在了颈窝上。嘴巴被杵在颈窝上的下巴挤得瘪瘪地歪吊着，气也透不畅快地呼呼有声。全身差不多摊放在沙发上，好像那不是有一个有生命的躯体，而是没有生命的血肉。

妈不再关心锁没锁门，会不会丢东西；不再像过去那样，不管谁，哪怕是我进门，也要如临大敌地问一声：“谁？！”

就是跟我到了美国，住在我任教那个大学区最安全的教职员公寓里，对公寓里其他人出入不锁门的现象，妈也总是放心不下，多次让我提醒他们注意锁门。我只是随口应承着，并没有认真去做。妈见没有成效，就“提醒”不止。弄急了我就会说：“锁门干什么，谁能来偷咱们或是抢咱们呢？咱们有钱吗？没有。公寓里的家具人家也不会要；咱们的衣服即便偷去也没法穿，尺寸不对。再说，咱们俩不论从哪方面来说，都不对那些歹徒的胃口，您就放心吧。”

妈一生处在无所依靠，不但无人保护，还要保护我的情况下，对门窗的严紧自然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。不过她在世的时候我并没有求其甚解，甚至觉得这种过度的谨慎纯属多余。直到妈过世以后，当我细细回顾她的一生的时候，才有些许的感悟。

就连妈平时赖以解闷的电视也不再吸引她了，虽然电视如她醒时那样总在开着。也不再暗暗地为我关心天气预报，因为我和小阿姨每日要在先生和母亲两处交替地来回穿梭。

既然我已身为他人之妇，就得谋为妇之政。晚上过先生那边去给他做晚饭，以及恪尽我其他的为妇之道；一早再从先生那边过到母亲这边来，所谓的陪伴母亲、服侍母亲，给母亲做一顿

中饭,外带在电脑上打字挣钱养家。所以妈老是希望天气晴好,免得我这样窜来窜去地被风吹着、被雨淋着、被太阳晒着……提醒我及时地加减衣服。妈去世后,再也没人为我听天气预报,让我注意加减衣服,或是出门带伞了。

所谓的陪伴母亲也是徒有其名。满头大汗地进得门来,问一声安,和她同吃一顿早餐之后,就得一头扎进电脑。不扎进电脑怎么办?写作既是我之所爱,也是养家糊口的手段。

不知道为什么家庭负担那么重,常常觉得钱紧。家里难得吃一次山珍海味,又少着绫罗绸缎,更没有红木家具、纯毛地毯。一应家什尽量寻找“出口转内销”,力求别致而又花钱少。妈更没有给我什么负担,不但没有给过我什么负担,直到妈去世的那一天,还在倾其全力地贴补我。她的每一分养老退休金都花在了我们的身上。最后,她每月的养老退休金已有一百五六十元之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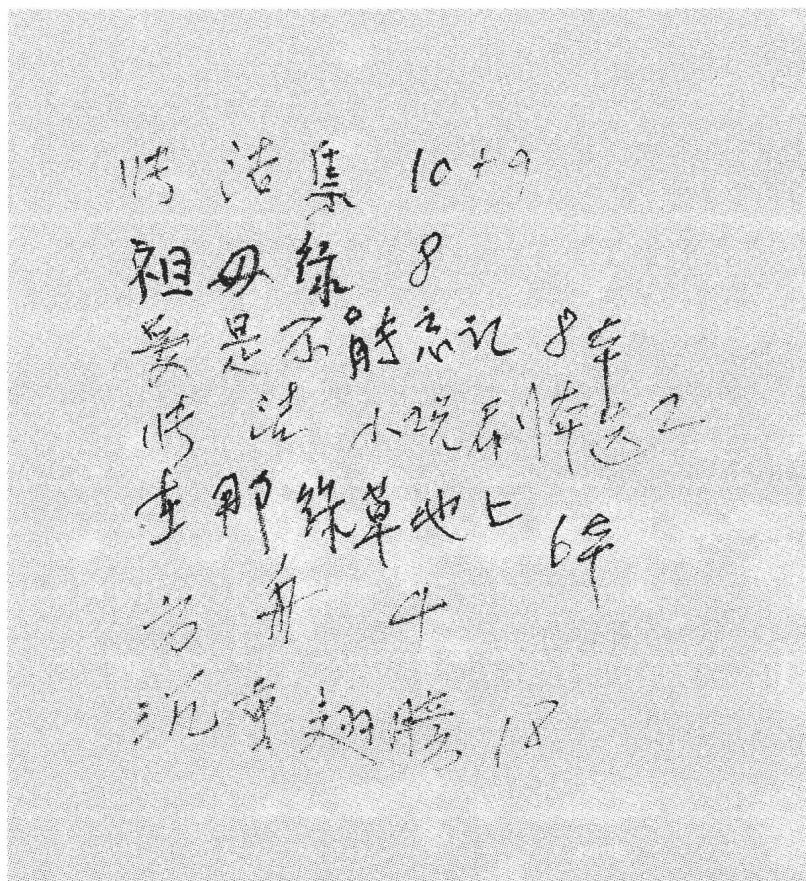
十多年前,当妈还没有这么多退休金,而我的月收入也只有五十六块钱的时候,以她七十岁的高龄,夏天推个小车在酷热的太阳底下卖冰棍,冬天到小卖部卖杂货,赚点小钱以贴补我无力维持的家用。那时候卖冰棍不像现在这样赚钱,一个月干下来,赚多赚少只能拿二十多块钱,叫做补齐差额。即卖冰棍或卖货的收入,加上退休工资不得超过退休时的工资额。但对我们来说,这二十多块钱,就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。

只是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,妈才不上街卖冰棍、卖杂货了。记得我将第一笔稿费一百七十八块钱放在她手里,对她说“妈,咱们有钱了,您再别出去卖冰棍了”的时候,她瘪着嘴无声地哭了……

到现在,我的眼前还时常浮现出那些又大、又浓、又重、又急的泪滴。当时,妈坐在我们二里沟旧居朝北那间小屋的床上,那

张床靠墙南北向地放着，她面朝西地靠坐在顶着南墙的床头旁……

但是好景不长，后来我们经济上稳定了，可是妈更操心了。



母亲记录的张洁部分作品清单

早餐也很简单，一杯牛奶、一个鸡蛋而已。一杯牛奶能喝多长时间？这就是妈盼了一夜的相聚。给母亲做饭也赶不上给先生做饭的规模，一般是对付着填饱肚子即可。比起母亲，先生毕

竟是外人,我该着意行事。这也是母亲的家教,自己家里怎么苦,也不能难为外人。这和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,莫教天下人负我的理论正好相反。而母亲到底是自己的亲娘,不论怎样,她都不会怪罪我、挑我的理。不但不会怪罪、挑理,甚至千方百计地替我节省每一个铜板。

有一段时间妈老是尿道感染,我觉得十分奇怪。按理说,家里根本不存在诱发尿道感染的条件。后来发现,她小解后根本不用卫生纸,而是用一块小毛巾。我问她:“您干吗不用卫生纸,这多脏呀。细菌会在上面繁殖的,难怪您常常尿道感染。”

妈说:“不脏,过几天我就把毛巾煮一煮,消消毒还能用。用纸多浪费呀。”

那时候一卷卫生纸才两毛五分钱,我是说最便宜的那种粗卫生纸。我们家从没用过类似金鱼牌那种细卫生纸。就是这两毛五分钱的粗卫生纸,妈也舍不得用。她老是说:“你那钱赚得多不容易。”

我把小毛巾给扔了:“每天煮一次都不行,您还几天煮一次!以后再不能这么干了。您这么节省难道我就能发财吗?”

从那以后,妈没再尿道感染。可是我又发现,她就是用卫生纸,也是很小的块。怎么跟她说,她也改不了。

早饭以后,妈就盼着午饭。因为我在准备午饭的时候,就把妈叫到紧连着厨房的小厅里,为的是趁我做午饭不能写文章的时候,和妈多呆一会儿、多说几句话。可是到了七月底,她就是想和我多呆一会儿、多说几句话,也没有那个心力了。只是一味地昏睡。我知道,但凡有一点心力,她都不会舍弃哪怕是几分钟和我相聚的机会。

妈又怕影响我的写作,总是克制着想要守着我呆一会儿的

北京精益眼镜公司（验光）处方

公司地址：宣内大街114号 电话：65,6286

门市部地址：西单北大街135号 电话：66,5223

姓名 张明政 性别 男 年龄 22

（此方在外店配镜仅供参考）

裸眼视力		球面	圆柱	轴线	斜视	基底	矫正视力
远用	右	1.00		22°12'19"			0.6
	左	1.00					
近用	右			7.00+	3.50		
	左						

瞳孔距离：远用 64 mm 近用 58 mm

19 9 年 9 月 2 日 验光

北京精益眼镜公司

电脑验光费收据

Nº 0044488

姓名 张明政 年 月 日

电脑验光费壹元捌角（报销凭证）

当天有效 过期作废

公司地址：宣内大街114号 电话：65.6286

门市部地址：西单北大街135号 电话：66.5223

经手人

母亲配眼镜的验光处方和验光费收据，一九九〇年九月。

愿望。就连给陪伴她度过许多寂寞时日的猫煮猫食,也要歉歉地、理亏似的打个招呼:“我给猫煮点食儿,不影响你吗?”或是:“我给猫剁点食儿,就几分钟。”

但是任谁,浪费起我的时间、精力、心血,都慷慨得很。这就是妈和任谁的根本不同。

妈对我那台已然算不上先进的电脑,始终怀着一丝敬畏。有那么两次,就在七月或是八月,她扶着我工作间的门框,远远地站在我和电脑的后面,说:“我都不敢往前靠,生怕弄坏了它。”

我把妈拉到电脑跟前,让她看我如何在电脑上操作,以及一通操作后电脑上出现的文字,“干吗不敢往前靠,又不是纸糊的。您瞧,多方便、多清楚啊。”

妈要不能往前靠,谁还能往前靠!只有她,才是最有权利拥有我和我的一切的人。但我始终没有跟她说过这些,总觉得这是无需言表的。加上我一向羞于表示温情,几乎没有对她说过什么温馨的话。现在,一想到那些话可能带给她的满足和快乐,我就追悔无穷。

我不知妈是否真的看到了电脑上的字,但我却听见她说:“真好啊!”

我说过,妈这时的视力几乎等于零了。所以,与其说她是在赞叹电脑的种种妙处,不如说她是在为竟然能使用电脑写作的女儿而自豪,是在表达对我的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通过各种努力、用各种方式给她争了一口气的感慨。

她总算看到了我怎样在电脑上工作,要是那两次她没有偶然地站在我的身后、没有偶然地看到我在电脑上如何工作的话,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拉她来看看电脑,就会给她极大的安慰的。

妈出现了重听的现象,还常常听错。

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,是唐棣必定和我们通话的时间。

唐棣七月二十八号来电话的时候,妈几乎听不出什么了,只是象征性地抱着听筒,全靠事后我给她转述。虽然听不出什么,那她也高兴,毕竟那是她最爱的人的声音。

接着就是小便失禁,多饮多尿。妈自己也奇怪:“我怎么这么渴啊!”到现在我好像都能看见她不时从沙发上爬起来,到窗台上去拿杯子喝水的情景。那是一只早期生产的磁化杯,很重。杯身漆着枣红色的冰花漆。

我说:“是不是天气太热了?”就买很多西瓜给她吃,但是并不解决问题。

我的耳边现在还常常响起妈那诉诸于我的声音,声音里饱含着我一定能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的信赖。可我辜负了她的信赖,我不但没有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,她还就此去了。

感觉越来越麻木,感情越来越淡漠……想起一九九〇年七月,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,妈并没有显出过度的悲伤。不像过去,好像再也见不到唐棣似的哭得十分凄惨。我和唐棣当时以为,这是因为她很快会再去美国的缘故。这也许是一个原因,但更可能的是因为妈的垂体瘤,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了。

后来就连我和先生在妈病房里争执不休的时候,妈也只是扶着墙默默地躲出病房,站在病房的走廊里等候争执的结束。

妈说话开始颠三倒四……

可我还是没有想到妈病了。

记忆中妈很少生病,或许生了病也不告诉我,而是自己到医院看看了事,她常常是独自面对一切。

比如说一九六六年妈第二次割小肠疝气。

第一次手术是哪一年做的,我记不清楚了,反正是在河南。那时候妈还在郑州第八铁路小学教书,五十岁多一点的样子。难道我没在郑州吗?反正我没能陪她到医院去做那个手术。

那一次手术等于白做,很快就复发了。也难怪,差不多三十年前,一个外省医院,敢割盲肠也就不错了,何况这个手术比割盲肠还复杂一点。

一九六六年妈第二次割小肠疝气的时候,是五十五岁的年龄。按说我们都在北京了,我本应该到医院去照顾她,可是我没有。那时,我正在将功补过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,争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,正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时候,自然就把妈扔在了一旁。以我当时的“错误”,竟然还当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,可以想见我卖命到了什么程度。

也许还因为那时的护士比现在负责,医院也不兴陪住。

我带着三岁的唐棣,有数的几次到医院去看望妈。不但没有给妈送过什么可口的饭菜、水果、甜点,反倒在医院里吃她给我们定的病号饭。我们趴在病房的椅子上,呼哧呼哧吃得很香。我一直记得那顿病号饭,鸡蛋、木耳、黄花、肉片,雪白的富强粉打卤面。那时候,这样的饭,我们觉得好吃得不得了。

而一九八七年我又到欧洲去了,一去就是五个月。回国当天,我就发现妈的脸色黄如表纸,隔壁邻居是位大夫,她悄悄告诉我她的怀疑,根据母亲的脸色,她分析可能得了胰腺癌。

马上带妈去看医生。

那时我们的住处和西苑大旅社只有一墙之隔,可是怎么也

叫不到出租汽车。不是说刚刚下了晚班,就是刚刚上班工作还没有派定。想不到偌大的北京,就是找不到一辆可以把妈拉到医院去的汽车。我又不会蹬三轮,就是会蹬,又上哪儿去找一辆三轮板车?人一到急眼的时候,就急出了机灵。我拦住一辆出租车,开口就对他说:“我付给你外汇。”这才叫到了车。为了感谢这位终于把母亲拉到医院的司机,我付给了他一张超过几倍车费的外汇券。

北大医院著名的B超专家陈敏华大夫亲自给妈做了B超,排除了胰腺癌的可能。但她肯定地告诉我,妈患了黄疸性肝炎。

我赶紧把妈送进她的合同医院。这一年她七十六岁,我五十岁。到了五十岁我才懂得如何多爱一点自己的妈。这次我打定主意陪她一起住进医院,以便好好照顾她,却又因为她生的是传染病,医院不让陪床。我只好看着母亲一个人住进传染病房。但我每天都去看她,送些有营养的汤水、菜肴。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,这已经算不了什么,倒是每天到医院为她换洗内裤才是我对她的挚爱。别的衣服都可让阿姨代劳,但妈的内裤得由我亲自动手,因为粪便、体液是传染黄疸性肝炎的一个重要途径,当然不能推给阿姨。我想都没想过给母亲换洗内裤可能会使我传染上黄疸性肝炎,我只想要母亲感到身上清清爽爽、舒舒服服。她不让我这么做,可她管不了我。做完这些,我们就静静地谈一会儿话。我从她那再无所求的脸上看到,何为心满意足。而这点满足,也只在她生病的时候才能得到。我甚至想,妈为此可能还希望自己生病。

就在一九九一年最后这场病中,妈心满意足地说:“你看,我每次生病你都恰好赶了回来。”好像我总在她需要我的时候出现在她的身边。她就没想一想,如果我常常守着她,而不是为了这样那样的理由(偏偏不是为了她)跑来跑去常常离开她;或